

随着北上广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，这些城市隐现“人口拐点”的信号。据报道，北京已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趋势，上海外来常住人口首次负增长，广州则出现了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迹象。面对人口疏解，哪些人走了，哪些人会留下，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？

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

截至2015年末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。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，去年，北上广等城市隐现“人口拐点”的信号。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，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，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，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。

当前，江苏、安徽两省以及全国135个城市（镇）正在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。记者近日赴安徽、四川、湖北等地调查发现，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已经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，但在“零门槛”前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高，有县城2015年农转非仅200多人。随着农村户口“含金量”逐渐提高，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在城市买房、工作、生活，但选择把户口留在农村。

人口拐点来临？

据记者了解，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.9万人，但增幅下降，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.9万人。同时，北京2015年末城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.6个百分点。

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.41万人。这是新世纪以来，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，降幅为0.4%。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，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，总体看，“十二五”较“十一五”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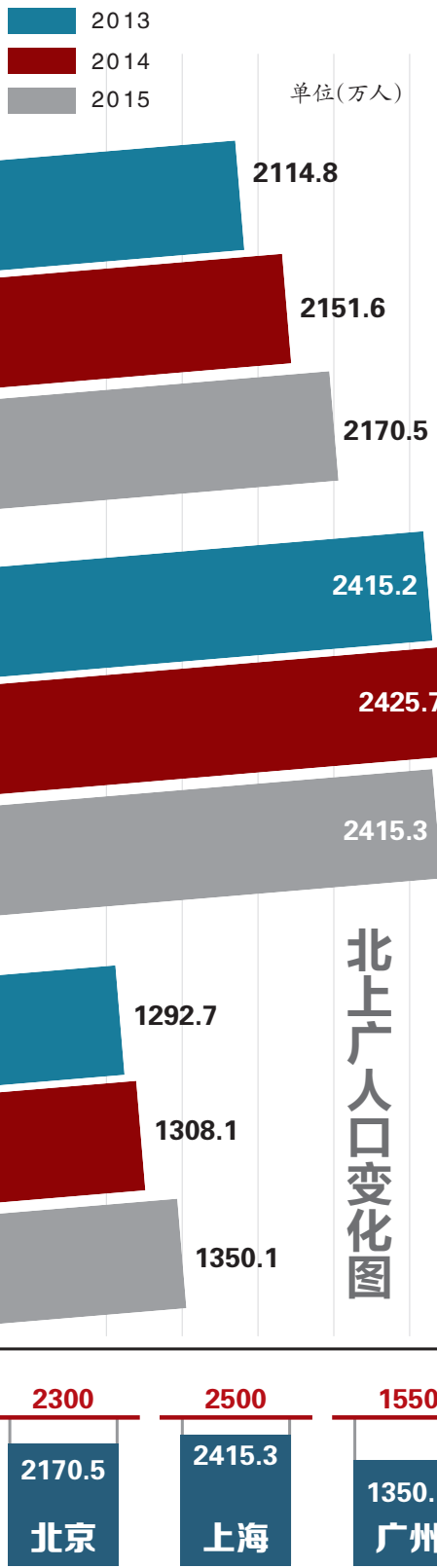
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？对此有观点认为，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。在上海，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、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，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。对于“账面人口”的变化，也有专家指出，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，其中大城市严控、疏解人口成为主因。

据了解，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，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、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。在北京中关村疏解低端电子卖场的背景下，仅存的几家卖场之一——“鼎好”大厦负责保洁的陈先生告诉记者：“我在这里工作5年了。刚开始，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洁员工一共150人左右，现在已经不足100人。”

实际上，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，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，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。“市一级大会上，区级官员谈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，不像说起GDP那样‘谈笑风生’。”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。

“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，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，起码从‘账面’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，并以搬迁市场、拆除违建、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积极推进。”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说。

去哪儿了？



北上广分别设立的人口红线

出国留学回流率超50%

海归，曾是高水平、高薪酬的“代名词”。然而，近年来，随着大规模“海归潮”的出现，海归的素质出现分化，其待遇与预期也与此前形成明显落差。

据教育部统计数据，截至去年，我国出国留学回流率已超过50%。业内人士指出，随着出国留学从“精英化”逐步走向“大众化”，海归已从“黄金时代”逐步进入“镀金时代”，现在已步入“青铜时代”，海归“去光环化”将成必然趋势。

海归回国后都选择去哪儿发展了？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无疑是海归群体的“最爱”。教育部发布的《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》显示，参与调查的留学回国人员中，49.34%的人期望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地区寻找职业发展机会。

业内人士分析称，一方面，海归留学攻读的工商金融、高新技术等领域专业，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能够获得更多、更合适的就业选择机会；另一方面，当前留学大军中，带有教育投资性质的自费留学占据绝大部分，他们在归国就业时薪酬回报是重要考虑因素，各类企业总部聚集的一线城市具有更强的吸引力。

从瑞典一所名校获得辐射监测专业硕士的海归韦知华，尽管求职9个月才在上海找到工作，但自感已十分庆幸。韦知华说，他所学专业在国内就业非常窄，全上海从业人员不超过100人，就更别提提到其他城市了。

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，2009年左右调查显示，当时归国人员中98%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，只有2%去了中西部地区。当前北京等地落户难度增大，而中西部城市通过政策层面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渐加大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“2015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”显示，中部和西部城市，尤其是成都、西安、武汉等地对海归的吸引有所增加，调查群体中有11.6%的海归选择在成都、西安、武汉、郑州四城就业。

而各地基层干部甚至农村村官中，近年来也陆续出现海归的身影。2011年北京市招考大学生村官首次向归国留学生放开之后，首次招考便有20人报名参加，其中4人最终被录取。

2012年，湖南长沙县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当“政府雇员”，吸引了110多名海归报名，最终10名海归被选中并被派往乡镇基层工作3年。

重庆80后小伙子秦明飞，2011年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国后，到湖南衡山县贺家山村当大学生村官。当村官一年多，他借助自己在耶鲁参加实践活动四处筹款的经历，坐火车四处奔波帮村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筹集到80多万元资金。3年期满后，秦明飞又被调到另一个乡镇的白云村继续做村官，并创办“黑土麦田”公益组织，为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创客提供众筹平台。

（据新华社北京电）

“人去哪儿了”问题背后是协调发展

随着北上广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，这些城市隐现“人口拐点”的信号。据报道，北京已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趋势，上海外来常住人口首次负增长，广州则出现了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迹象。从数据来看，人口控制取得了显著成效。但对于这种变化趋势，我们需要有更深入的评估与思考。

事实上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很多问题，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。城镇化初中期，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一个必然过程。在中国，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特大城市确已逼近资源、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，加强人口控制和疏解是非常现实的议题。但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经验也证明，避免资源和机会过度集中在少数特大城市的前提。

在欧美发达国家，就有不少特色小城、魅力小镇，比如世界知名的哈佛、耶鲁和剑桥、牛津等大学，都不在大都市。相应地，很多人宁愿住在小城市，就是因为在小城市也能享受到与大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，甚至幸福指数更高、生活压力更小。

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提出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，实际上也给中国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——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，根本出路在协调发展。如果能够实现协调发展，让生活在中小城市、广大乡村的人，都享有人生出彩、实现幸福的机会，或许无需用行政手段，就能实现超大城市人口的自然疏解，城乡活力也将同步提升。而长三角、珠

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也证明，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小城市不仅可以留住人口，更能吸纳人口。

另一方面，就目前特大城市疏解人口工作而言，每座城市都可以依据规划对人口进行引导，但这种引导需要以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为前提——虽然人口增长会给城市带来负担，但城市的活力源于人，城市的繁荣是生活于其中的各行各业的人共同创造的。正如在良好的自然生态中，大树、灌木与小草各争其荣，健康有活力的城市生态，也需要不同行业相互协作，需要白领、蓝领各得其所。

因此，疏解人口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千万不能陷入简单化思维。从生活经验看，城市里很多看似“低端”的产业，其实是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派生出来的。一旦这些“低端供给”被消除，“高端从业者”的生活也将不便，人们将花更多时间做自己不擅长的事，生活成本也将提高。比如，街头卖早餐的人少了，或许市容市貌会更整洁，但城市生活的便捷性将大打折扣。

“城市病”是典型的“综合征”，要对症下药，更要综合施策，它考验的是治理能力、治理智慧和治理技巧。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，摒弃“一亩三分地”思维，着力实现协调发展，才能让大中小城和乡村都成为生机勃勃的美好家园。

（新华社北京新媒体专电）